

# 现实受欺负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 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及道德推脱的调节作用\*

高玲 花苏晴 杨继平 王兴超\*\*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太原, 030006)

**摘要**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法对 2407 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 探讨了现实受欺负对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 以及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和道德推脱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 (1) 现实受欺负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2) 愤怒反刍在现实受欺负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 现实受欺负通过愤怒反刍对网络欺负行为产生影响的间接效应受到道德推脱的调节。具体来说, 对于道德推脱水平高的青少年而言, 愤怒反刍会对网络欺负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而对于道德推脱水平低的青少年而言, 愤怒反刍对网络欺负行为的预测效应变得不再显著。

**关键词** 现实受欺负 愤怒反刍 道德推脱 网络欺负行为 青少年

## 1 引言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 网络与青少年生活的联结越来越紧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9 年的调查显示, 截止 2019 年 8 月, 我国 10~19 岁儿童青少年网民的数量达到 1.44 亿。网络在给青少年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在某些方面给青少年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危害。网络欺负行为就是这些危害中的一种。网络欺负行为是指个体或群体借助网络媒介对特定对象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 包括在网上辱骂、骚扰、威胁、排斥等多种形式 (Smith et al., 2008)。已有研究表明网络欺负行为对青少年的心理有显著的影响 (Fisher et al., 2016), 会引发暴力、反社会行为等问题行为 (Kowalski et al., 2014), 以及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Kim et al., 2018; Wang, Xie, et al., 2019)。鉴于网络欺负行为的负面影响, 探讨哪些因素会导致青少年更易于产生网络欺负行为成为了一件十分重要且迫切的事情。以往的研究发

现, 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欺负、虐待的青少年更容易表现出网络欺负行为 (Wang et al., 2019; Wright & Li, 2012), 但是现实受欺负对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产生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的。基于这一考量, 本研究将尝试性地探究现实受欺负对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 以及愤怒反刍和道德推脱在这一影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 1.1 现实受欺负与网络欺负行为

现实受欺负是指传统欺凌中的受欺负行为。受欺负 (bullying victimization) 指个体遭受到他人所施加的身体、言语、财物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侵害。青少年的受欺负主要来自于其同伴。现实受欺负与青少年的抑郁、焦虑等内化问题显著相关 (Gini et al., 2018), 也与攻击、犯罪等外化问题有关 (Reijntjes et al., 2011)。根据一般压力理论的观点, 压力会使个体产生欺负、攻击等行为。Agnew (1992) 认为压力可被分为三类: (1) 未能获得积极的刺激; (2) 失去积极的刺激; (3) 真实的或预期的有害刺激的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6YJA190009; 20YJC190021) 和山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

\*\* 通讯作者: 王兴超, E-mail: wangxch9@126.com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210410

出现（如现实受欺负）。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欺负时会感知到压力，进而产生愤怒、沮丧等负面情绪，从而更有可能产生网络欺负行为。国内外的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欺负的青少年更易于在网上欺负他人（Jang et al., 2014），青少年同伴侵害可以显著地预测其网络欺负程度（张雪晨等，2019）。然而网络欺负行为的发生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的，现实受欺负如何导致网络欺负行为？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在遭受现实受欺负后在网上欺负他人？这些问题对更好的制定针对网络欺负行为的干预计划至关重要，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

## 1.2 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

愤怒反刍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反刍思维，是无意识地反复出现愤怒相关情景的思维倾向。个体会反复关注愤怒事件及其诱因，不断地反思可能的行为应对方式及后果等（Sukhodolsky et al., 2001）。愤怒反刍是一个认知过程，开始于引发个体愤怒情绪的事件之后（Denson, 2013）。青少年受欺负后会产生愤怒的情绪（Ak et al., 2015; den Hamer & Konijn, 2016）。当愤怒被激活时，个体就不易于控制自己的愤怒反刍（Suhr & Nesbit, 2013）。因此，愤怒反刍的一个自然关联是被激怒，尤其是当引起愤怒的刺激是人际关系的时候，而受欺负可以被理解为导致愤怒反刍的人际挑衅事件（Cook, 2015）。已有研究发现，受欺负的儿童和青少年倾向于采用反刍和顺从的应对策略（Hampel et al., 2009）。Zsila 等（2018）的研究也表明与没有参与网络欺负的人相比，网络欺负的受害者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愤怒反刍。除此之外，愤怒反刍与网络受欺负也存在显著正相关（Cook, 2015）。个体对愤怒事件的反复思考会延长其愤怒情绪并激活其与攻击行为相关的情感、认知，进而唤醒个体的攻击性（Ruddle et al., 2017）。Peled 和 Moretti（2010）的研究表明愤怒反刍是敌意、言语攻击和身体攻击的重要预测因子。也就是说，愤怒反刍会增强攻击行为，因为它会令人在生气的事件后增加并保持愤怒（Bushman et al., 2005; Rusting & Nolen-Hoeksema, 1998），并且可能通过干扰或消耗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进而导致个体攻击性的增加（White & Turner, 2014）。除了愤怒反刍，一般反刍思维也可以显著地预测大学生的网络攻击行为（金童林等，2018）。

一般攻击理论从个人和情境因素、内部状态以

及评估和决策过程三个层面简要地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产生攻击行为（Anderson & Bushman, 2002）。基于此，本研究认为现实受欺负作为情境因素输入变量，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内部状态（认知过程和情绪），使个体产生愤怒情绪，进而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激活或增加个体的愤怒反刍思维（Besharat & Pourbohloul, 2012），增加个体对挑衅事件的注意力，使个体反复思考受欺负的过程（Ruddle et al., 2017），从而增加个体的愤怒情绪和敌意，使个体处于攻击性启动状态（Pedersen et al., 2011）。当个体使用网络时，攻击性启动的状态可能会导致其更易于在网上欺负他人。因此，根据一般攻击理论，本研究提出愤怒反刍作为中介变量，可能会中介现实受欺负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

## 1.3 道德推脱的调节作用

现实受欺负可能通过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影响网络欺负行为，但并不是所有愤怒反刍水平高的个体都会在网上欺负他人，愤怒反刍与网络欺负行为的关系可能会受到一些个体特征变量的调节。已有研究表明，在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形成机制中，道德推脱是一个重要的预测变量（Wang, Yang, et al., 2019; Wang et al., in press）。道德推脱是指个体产生的一些特定的包括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使其伤害性显得更小、最大程度地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和降低对受伤目标痛苦的认同的认知倾向（杨继平等，2010）。根据道德推脱理论，大多数人都形成了个人的道德标准，这些道德行为标准使个体进行自我调节，引导个体做出道德的行为，避免不良行为（Bandura, 1999）。当个体做出违背个人道德标准的行为后，个体可以通过道德推脱使道德自我调节机制失效，轻易地摆脱随后而来的内疚和自我谴责（杨继平等，2014）。因此，具有高道德推脱的青少年可能会使用一个或多个道德推脱机制，对网络欺负行为进行认知重建，合理化其做出的网络欺负行为，从而出现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Orue & Calvete, 2019; Wang et al., 2017）。

相关实证研究也显示，道德推脱可以在愤怒反刍与攻击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高水平的道德推脱可以增强愤怒反刍对攻击行为的影响；而对于道德推脱水平低的个体而言，愤怒反刍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变得不再显著（Wang et al., 2018）。那么，较高的道德推脱水平也可能增强愤怒反刍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本研究假设道德

推脱可以调节愤怒反刍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相对于道德推脱水平较低的青少年,道德推脱水平较高的青少年越易于愤怒反刍,其网络欺负行为会变得越多。

综上所述,为探讨现实受欺负、愤怒反刍、道德推脱对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综合影响以及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尝试性地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理论模型图。基于以往研究,本研究提出了两个具体研究假设:

H1: 愤怒反刍在现实受欺负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2: 道德推脱调节愤怒反刍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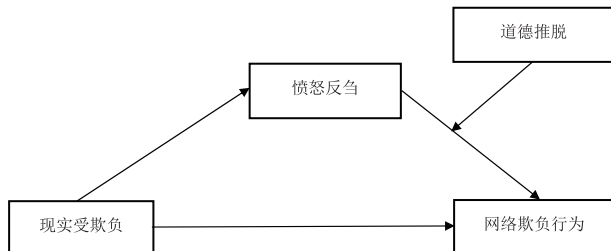


图1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理论模型图

## 2 研究方法

###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山西省太原市、长治市等7所公立全日制初中的2407名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测验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青少年在安静的教室里填写问卷,主试于测验完成后回收问卷。在所有样本中,男生1191名,女生1202名,14人未报告性别。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2.75岁(标准差为.58岁,年龄范围为11~16岁)。

### 2.2 研究工具

#### 2.2.1 现实受欺负

采用由Olweus编制,张文新等人修订的儿童欺负问卷(初中版)(张文新等,1999)中关于受欺负类型的六个题目来测量青少年的现实受欺负程度。该问卷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现实受欺负的频率越高。已往研究表明,该问卷的信效度指标良好(褚晓伟等,2016)。本研究中现实受欺负问卷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83。

#### 2.2.2 愤怒反刍

采用由Sukhodolsky编制,罗亚莉等人修订的愤怒反刍思维量表中文版,测量青少年的愤怒反刍思维(罗亚莉,刘云波,2017)。该量表共19个条目,

包括事后愤怒、愤怒记忆、报复想法、理解原因四个维度,采用4级记分方式,得分越高表示愤怒反刍思维越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愤怒反刍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94。

#### 2.2.3 青少年道德推脱

采用Bandura等(1996)编制,杨继平和王兴超(2012)修订的青少年道德推脱问卷测量青少年的道德推脱水平。该问卷包括八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四个条目,共计32个条目。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道德推脱水平越高。该问卷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被广泛使用,且信效度良好(Wang et al., 2017)。本研究中道德推脱问卷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94。

#### 2.2.4 网络欺负行为

本研究使用Wright等人(2015)编制的网络欺负问卷调查青少年在网络上欺负他人的情况。该问卷已在中国青少年中使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Wang et al., 2016)。该问卷有9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从不,5=总是),问卷的均分越高,表示网络欺负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网络欺负问卷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93。

###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0.0、Amos 24.0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 3 结果分析

###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数据处理前,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对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共有9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且第一个公共因子只能解释总变异量的26%。这一比例远小于Podsakoff等人推荐的40%的判断标准(Podsakoff et al., 2003),说明在本研究中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 3.2 现实受欺负、愤怒反刍、道德推脱和网络欺负行为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现实受欺负与愤怒反刍、网络欺负行为、道德推脱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网络欺负行为与愤怒反刍、道德推脱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愤怒反刍与道德推脱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别与现实受欺负、愤怒反刍、网络欺负行为、道德推脱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年龄与现实受欺负、网络欺负行为、道德推脱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表1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1. 现实受欺负	1.31	.57	1					
2. 愤怒反刍	1.78	.62	.27***	1				
3. 网络欺负行为	1.21	.50	.22***	.30***	1			
4. 道德推脱	1.70	.61	.22***	.34***	.46***	1		
5. 年龄	12.75	.58	.10***	.00	.10***	.07**	1	
6. 性别			-.16***	-.08***	-.11***	-.12***	-.07**	1

注：\* $p < .05$ ，\*\* $p < .01$ ，\*\*\* $p < .001$ ，下同。

相关。

### 3.3 现实受欺负对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根据本研究的理论假设，运用 Amos 24.0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2。采用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和调节效应的检验，研究共重复抽样 2000 次（温忠麟，叶宝娟，2014）。具体检验过程为以下 3 个步骤：首先，采用吴艳与温忠麟（2011）推荐的项目打包策略中的因子负荷平衡法将现实受欺负、网络欺负行为均打包为 3 个指标，采用内部一致性法，根据维度将愤怒反刍打包为 4 个指标，将道德推脱打包为 8 个指标，并对所有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构建愤怒反刍与道德推脱的交互项。在进行交互项配对指标计算时，由于两个潜变量的指标不一样多，依据吴艳等人的建议，对道德推脱的 8 个指标打包后进行配对，并按照“大配大，小配小”的原则将指标配对相乘，共形成 4 个指标（吴艳等，2011）；最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匹配数据进行估计。模型的拟合指数为  $\chi^2 = 2691.12$ ,  $df = 204$ ,  $RMSEA = .07$ ,  $CFI = .94$ ,  $TLI = .93$ ,  $IFI = .94$ ，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现实受欺负可以正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 ( $\beta = .09, p < .001$ )，正向预测愤怒反刍 ( $\beta = .30, p < .001$ )，愤怒反刍可以正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 ( $\beta = .14, p < .001$ )；现实受欺负对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过程中，愤怒反刍的间接效应大小为 .04，其 95% 的置信区间为 [.02, .06]，置信区间内不包含 0，说明愤怒反刍在现实受欺负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同时，道德推脱对网络欺负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 ( $\beta = .41, p < .001$ )，其 95% 的置信区间为 [.33, .49]；愤怒反刍与道德推脱的交互项对网络欺负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 ( $\beta = .14, p < .01$ )，其 95% 的置信区间为 [.04, .25]，说明道德推脱可以显著地调节愤怒反刍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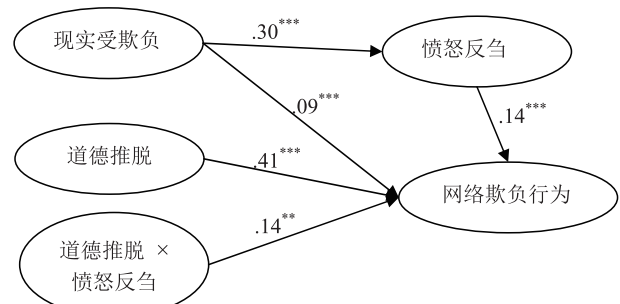


图2 现实受欺负对网络欺负行为影响的内部机制模型图（标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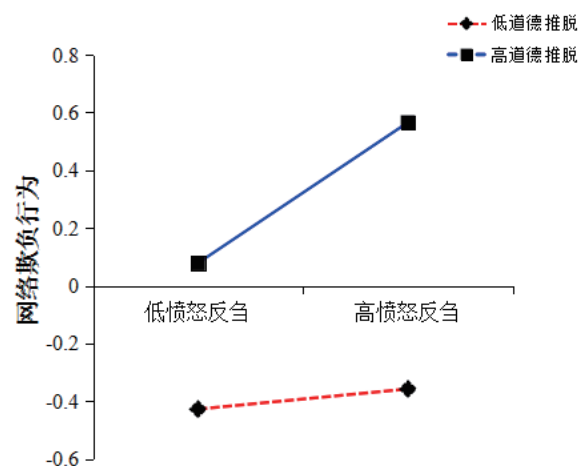


图3 道德推脱在愤怒反刍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为了更好地描述道德推脱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道德推脱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临界值分出高分组和低分组，然后做出道德推脱在愤怒反刍与网络欺负行为间的简单斜率检验图（图 3）。结果表明，当道德推脱水平较高时，愤怒反刍可以显著地预测网络欺负行为， $B_{simple} = .24, p < .05$ ；当道德推脱水平较低时，愤怒反刍对网络欺负行为的预测作用变得不再显著， $B_{simple} = .04, p > .05$ 。

##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现实受欺负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青少年现实受欺负水平越高，其网络欺负行为水平会越高，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 (Jang et al., 2014)。然而,这一关系背后的中介和调节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未知的。本研究基于一般攻击理论和道德推脱理论,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来探讨两者关系背后的机制。结果表明,现实受欺负对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通过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来实现。此外,道德推脱调节了愤怒反刍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愤怒反刍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显著关系只存在于高道德推脱水平的青少年中。

#### 4.1 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愤怒反刍在现实受欺负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与本研究的研究假设1相一致。也就是说,现实受欺负对网络欺负行为的作用是间接的:现实受欺负能增强青少年的愤怒反刍水平,进而增加其网络欺负行为。本研究首次发现了愤怒反刍在帮助解释现实受欺负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发现支持了一般攻击理论的观点 (Anderson & Bushman, 2002),表明现实受欺负作为情境输入变量,会影响个体的内部状态(情绪、认知),从而增加个体的攻击性,使个体表现出网络欺负行为。一方面,当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欺负后,他们会产生愤怒的情绪 (den Hamer & Konijn, 2016)。面对这种愤怒的情绪,受欺负的青少年会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 (Hampel et al., 2009)。他们会更易于出现愤怒反刍思维,反复思考他们自己受欺负的情景及可能的行为应对方式和后果,并且较难将注意力从愤怒情绪、经历转移到其他事情上 (Cook, 2015; Zsila et al., 2018)。另一方面,愤怒反刍会导致青少年易于出现网络欺负行为。这可能是由于愤怒反刍思维使受欺负的青少年沉浸于受欺负经历,长时间的专注于愤怒的情绪和攻击性的想法,这维持并加剧了他们的愤怒体验,导致他们化解愤怒的能力进一步被削弱 (Wang et al., 2018)。因此,愤怒反刍思维降低了受欺负青少年的自我调节能力,增加了他们的愤怒情绪和攻击性 (Pedersen et al., 2011),这使得他们更易于在网络上发泄自己的愤怒情绪,出现网络欺负行为。

#### 4.2 道德推脱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探讨了道德推脱对愤怒反刍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的道德推脱水平可以影响愤怒反刍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与以往道德推脱在愤怒反刍与攻

击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Wang et al., 2018)。具体而言,对于道德推脱水平高的青少年,愤怒反刍对网络欺负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而对于道德推脱水平低的青少年,愤怒反刍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显著。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道德推脱包括道德辩护、忽视或扭曲结果、责备归因等推脱机制 (杨继平等, 2010),这些推脱机制可以用来解释青少年做出的不道德行为,也可以用来解释青少年在网络上的欺负行为。具体地说,道德推脱水平高的青少年,会认知重建自己做出的伤害他人的行为,使伤害行为在道德上变得可以接受。换言之,他们在网络上欺负他人后,会为自己做出的网络欺负行为进行道德辩护,以合理化自己的网络欺负行为,从而减少了自己的内疚情绪和对受害者的同情。因此,当道德推脱水平高的青少年沉湎于受欺负经历和愤怒情绪,处于攻击性启动状态时,他们更有可能由于缺乏对不道德行为的愧疚情绪和对受害者的同情,而心安理得地做出网络欺负行为。相比之下,道德推脱水平低的青少年具有较强的道德自我调节功能,较难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合理化。他们在做出网络欺负行为后,会更容易受到内在良心的谴责,感到内疚和自责。因此,道德推脱水平低的青少年在做出社会行为时,会受到自己内在道德标准的严格约束,即使他们愤怒反刍的水平很高,处于很愤怒的状态,他们也较难做出网络欺负他人的行为。

总体上,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的视角来看,本研究探讨了愤怒反刍在现实受欺负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和道德推脱对这一间接影响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明晰了现实受欺负对网络欺负行为产生影响的发生机制。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在教育实践中形成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更有效的机制。通过将道德推脱作为调节变量纳入模型,本研究发现了道德推脱在愤怒反刍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所起的重要作用,说明在教育实践中对愤怒反刍的干预(例如,分心、转换想法和正念训练)将有利于减少高道德推脱水平青少年表现出的较强的网络欺负行为倾向。

#### 4.3 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回忆性的自我报告的问卷法,容易受到测量误差的影响和被试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设计是横向的,限

制了因果推断。因此未来还需要结合其他测量方法（他人报告法）和纵向设计进行研究。其次，本研究中青少年的现实受欺负、网络欺负行为平均分较低，说明网络欺负行为的发生率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研究结果和研究的实践价值。因此未来的研究还需要结合统计手段或实验设计的方法。最后，本研究使用了问卷法测量愤怒反刍思维，然而愤怒反刍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倾向，可以通过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来进一步研究愤怒反刍思维产生的内部机制。

## 5 结论

（1）青少年现实受欺负水平越高，网络欺负行为水平越高。

（2）愤怒反刍在现实受欺负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现实受欺负通过愤怒反刍对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产生影响。

（3）现实受欺负通过愤怒反刍对网络欺负行为产生影响的间接效应受道德推脱的调节。道德推脱调节了愤怒反刍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于道德推脱水平高的青少年而言，愤怒反刍对网络欺负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而对于道德推脱水平低的青少年而言，愤怒反刍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显著。

### 参考文献

- 褚晓伟, 范翠英, 柴唤友, 宋快. (2016). 初中生受欺负与社交焦虑: 社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6), 1051-1054.
- 金童林, 陆桂芝, 张璐, 乌云特娜, 金祥忠. (2018). 暴力环境接触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 反刍思维与网络道德的作用. *心理学报*, 50(9), 1051-1060.
- 罗亚莉, 刘云波. (2017). 愤怒反刍思维量表中文版大学生人群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5(4), 667-670.
-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5), 731-745.
- 吴艳, 温忠麟. (2011). 结构方程建模中的题目打包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19(12), 1859-1867.
- 吴艳, 温忠麟, 侯杰泰, Marsh, H. W. (2011). 无均值结构的潜变量交互效应模型的标准化估计. *心理学报*, 43(10), 1219-1228.
- 杨继平, 王兴超. (2012). 道德推脱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心理学报*, 44(8), 1075-1085.
- 杨继平, 王兴超, 高玲. (2010). 道德推脱的概念、测量及相关变量. *心理科学进展*, 18(4), 671-678.
- 杨继平, 王兴超, 杨力. (2014). 观点采择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37(3), 633-638.
- 张文新, 武建芬, Jones, K. (1999).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中文版的修订. *心理发展与教育*, 15(2), 7-11, 37.

- 张雪晨, 褚晓伟, 范翠英. (2019). 同伴侵害和网络欺负: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7(1), 148-152.
- 周浩, 龙立荣. (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 Agnew, R. (1992).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30(1), 47-88.
- Ak, Ş., Özdemir, Y., & Kuzucu, Y. (2015). Cybervictimization and cyberbully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anger, don't anger m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9, 437-443.
- Anderson, C. A., & Bushman, B. J. (2002). Human agg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1), 27-51.
- Bandura, A. (1999).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3), 193-209.
- Bandura, A., Barbaranelli, C., Caprara, G. V., & Pastorelli, C. (1996).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2), 364-374.
- Besharat, M. A., & Pourbohloul, S. (2012). Mediation effect of anger rumin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mensions of anger and anger control with mental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5(2), 24-36.
- Bushman, B. J., Bonacci, A. M., Pedersen, W. C., Vasquez, E. A., & Miller, N. (2005). Chewing on it can chew you up: Effects of rumination on triggered displaced agg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6), 969-983.
- Cook, L. A. (2015). *Cybervictimization as a predictor of aggression and cyber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Examination of potential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
- den Hamer, A. H., & Konijn, E. A. (2016). Can emotion regulation serve as a tool in combating cyberbully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2, 1-6.
- Denson, T. F. (2013). The multiple systems model of angry rumin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7(2), 103-123.
- Fisher, B. W., Gardella, J. H., & Teurbe-Tolon, A. R. (2016). Peer cybervictimization among adolescents and the associated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5(9), 1727-1743.
- Gini, G., Card, N. A., & Pozzoli, T. (2018). A meta-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ial relations of traditional and cyber-victimization with internalizing problems. *Aggressive Behavior*, 44(2), 185-198.
- Hampel, P., Manhal, S., & Hayer, T. (2009). Direct and relational bullying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30(5), 474-490.
- Jang, H., Song, J., & Kim, R. (2014). Does the offline bully-victimization influence cyberbullying behavior among youths? Application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1, 85-93.
- Kim, S., Colwell, S. R., Kata, A., Boyle, M. H., & Georgiades, K. (2018).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Evidence of differential effects by sex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 typ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7(3), 661-672.
- Kowalski, R. M., Giumetti, G. W., Schroeder, A. N., & Lattanner, M. R. (2014). Bullying in the digital age: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yberbullying research among you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0(4), 1073-1137.



- Orue, I., & Calvete, E. (2019). Psychopathic traits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interact to predict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4*(11), 2313–2332.
- Pedersen, W. C., Denson, T. F., Goss, R. J., Vasquez, E. A., Kelley, N. J., & Miller, N. (2011). The impact of rumination on aggressive thoughts, feelings, arousal, and behaviou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0*(2), 281–301.
- Peled, M., & Moretti, M. M. (2010). Ruminating on rumination: Are rumination on anger and sadness differentially related to aggression and depressed mood?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32*(1), 108–117.
-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Y., & Podsakoff, N. 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5), 879–903.
- Reijntjes, A., Kamphuis, J. H., Prinzie, P., Boelen, P. A., van der Schoot, M., & Telch, M. J. (2011). Prospective linkages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in children: A meta-analysis. *Aggressive Behavior, 37*(3), 215–222.
- Ruddle, A., Pina, A., & Vasquez, E. (2017). Domestic violence offending behavior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examining childhood exposure, implicit theories, trait aggression and anger rumination as predictive factor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34*, 154–165.
- Rusting, C. L., & Nolen-Hoeksema, S. (1998). Regulating responses to anger: Effects of rumination and distraction on angry m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3), 790–803.
- Smith, P. K., Mahdavi, J., Carvalho, M., Fisher, S., Russell, S., & Tippett, N. (2008). Cyberbullying: Its nature and impact in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9*(4), 376–385.
- Suhr, K. A., & Nesbit, S. M. (2013). Dwelling on 'Road Rage': The effects of trait rumination on aggressive driving.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F: Traffic Psychology and Behaviour, 21*, 207–218.
- Sukhodolsky, D. G., Golub, A., & Cromwell, E. N. (2001).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Anger Rumination Sca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1*(5), 689–700.
- Wang, W., Xie, X. C., Wang, X. C., Lei, L., Hu, Q., & Jiang, S. (2019). Cyberbullying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social anxiety and neuroticism.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56*, 54–61.
- Wang, X. C., Lei, L., Liu, D., & Hu, H. H. (2016). Moderating effects of moral reasoning and gender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cyberbullying in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8*, 244–249.
- Wang, X. C., Yang, L., Yang, J. P., Gao, L., Zhao, F. Q., Xie, X., & Lei, L. (2018). Trait anger and aggress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anger rumination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25*, 44–49.
- Wang, X. C., Yang, L., Yang, J. P., Wang, P. C., & Lei, L. (2017). Trait anger and cyberbullying among young adul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moral identit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3*, 519–526.
- Wang, X. C., Yang, J. P., Wang, P. C., & Lei, L. (2019). Childhood maltreatment,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adolescents'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Fathers' and mothers' moral disengagement as moderator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95*, 48–57.
- Wang, X. C., Zhao, F. Q., Yang, J. P., & Lei, L. (in press). School climate and adolescents'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friends' moral identity.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 White, B. A., & Turner, K. A. (2014). Anger rumination and effortful control: Mediation effects on reactive but not proactive aggress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6*, 186–189.
- Wright, M. F., Aoyama, I., Kamble, S., Li, Z., Soudi, S., Lei, L., & Shu, C. (2015). Peer attachment and cyber aggression involvement among Chinese, Indian, and Japanese adolescents. *Societies, 5*(2), 339–353.
- Wright, M. F., & Li, Y. (2012). Kicking the digital dog: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young adults' victimization and cyber-displaced aggression.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5*(9), 448–454.
- Zsila, Á., Urbán, R., & Demetrovics, Z. (2018). Anger rumination and unjust world beliefs moder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psychiatric symptoms. *Psychiatry Research, 268*, 432–440.

# Tradi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The Roles of Anger Rumination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Gao Ling, Hua Suqing, Yang Jiping, Wang Xingchao*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is playing an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role in adolescents' daily life. However, the Internet not only brings convenience to adolescents' life, but also brings a lot of negative effects on their life.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is one of these negative effects. Som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cyberbullying is an increasingly common phenomenon that can lead to many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such as anxiety, depression, violence,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which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of adolescents. According to some previous studies, tradi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redictive variables of adolescents'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dolescents who have experienced tradi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cyberbullying perpetrators. However,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is relationship are still largely unknown.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adolescents'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mediating (i.e., how tradi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influences cyberbullying) and moderating mechanisms (i.e., when the mediating process is effective) underlying this relationship.

Data from the current study were collected as part of the first wave of an ongoing longitudinal study. We recruited 2,407 participants from seven junior high schools in Shanxi Province. All adolescents filled out questionnaires in a quiet classroom. When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self-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we checked the completeness of all questionnaires. In all samples (1191 boys, 1202 girls, and 14 participants who did not report gender), adolescents ranged in age from 11 to 16 year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12.75 years (standard deviation 0.58 years). We used SPSS 20.0 software and Amos 24.0 to conduct all statistical analyses. Before testing hypotheses, all variables were standardized. First, we used SPSS 20.0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Then, Amos 24.0 was us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nger rumin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oral disengage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e correlation among tradi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nger rumination,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were all significant. (2) Anger rumination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3) Moral disengagement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ger rumination an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Specifically, for adolescents with high moral disengagement, anger rumination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However, for adolescents with low moral disengagement, this relationship became not significant.

Our findings have sever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t provides an empir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searchers through te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nger rumin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oral disengagement. These results could shed light on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between tradi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expand the previous studies. From the practical perspective, it can contribute to design effec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and develop strategies to reduce anger rumination (e.g., distractions, switching thoughts and mindfulness training) to prevent and reduce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moral disengagement, anger rumination,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dolescents